

梁
鸿
著

外省笔记

20世纪河南文学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文学评论三部曲

外省笔记：

20 世纪河南文学

梁鸿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省笔记: 20 世纪河南文学 / 梁鸿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86-5692-2

I. ①外… II. ①梁… III. ①地方文学史—河南省—
20 世纪 IV. ①I209.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76925 号

外省笔记: 20 世纪河南文学

著 者: 梁 鸿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692-2 / I · 730

定 价: 68.00 元

印 张: 15.75 字 数: 365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上篇：史论

序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 / 3

绪 论 “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 / 77

第一章 断裂与背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

一、彗星划过天空 / 101

二、文化的断层 / 107

三、背离与挣扎 / 114

四、中庸与激进 / 120

第二章 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河南文学

一、历史的转折与河南文学的“亮点” / 133

二、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 / 139

三、文学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 / 152

第三章 新时期的“中原突破”

一、新时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 165

二、“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 / 171

三、“中原突破”的意义 / 182

四、“中原突破”的缺陷 / 191

第四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省文化空间与河南文学

一、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性 / 207

二、“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 / 228

第五章 “外省”的必然与无奈

下篇：作家论

第六章 师陀：“果园城”文化的“变”与“不变”

一、异乡和故乡 / 271

二、荒原之中的诗意 / 278

三、故乡情感和故乡意象 / 284

第七章 刘震云：“平民”立场的两难与民间生存世界

- 一、“故乡”的两极意义 / 293
- 二、“吵架”美学与“平民立场”的两难 / 302
- 三、民间的生存特性 / 313
- 四、闹剧冲动与语言的暴动 / 320
- 五、姥娘去了 / 333

第八章 周大新：冲出“圆形盆地”

- 一、“圆”与“不圆” / 344
- 二、“围猎”与“被围” / 354
- 三、“窥视者”的身份质疑与小保安之死 / 360
- 四、善恶辩证法 / 370

第九章 阎连科：“耙耧山脉”的隐喻与象征

- 一、《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 / 379
- 二、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 394
- 三、庆典、神话、暴力及其他 / 409

第十章 李洱：新的小说诗学的建构

- 一、百科全书式叙事 / 432
- 二、“共时性”存在结构 / 439
- 三、日常生活诗学空间 / 444

附 录 对话：“中原突破”的陷阱

- 河南作家：集体的困境 / 453

- 李准：一位缺少余音的歌唱家 / 457
- 张一弓：与时俱进的“时代的记录员” / 462
- 乔典运：农民哲学家的局限性 / 466
- 张宇：聪明给智慧挖下陷阱 / 469
- 李佩甫：在泥和水中挣扎 / 475
- 田中禾：才华与热情的浪费 / 479
- 刘震云：求变的狂呼与两难 / 482
- 刘庆邦：单腿踏步的舞蹈 / 486
- 河南年轻作家 / 488

参考文献 / 491

再版后记 / 497

上篇：史论



序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

王富仁

一

我原属山东聊城地区茌平县人（1958年后我所在的琉寺区才划归高唐县），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区域划分中，属于晋（山西）冀（河北）鲁（山东）豫（河南）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设省、市建制的时候，我们属于平原省，是由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共同构成的，省会就是现在河南的新乡市，殷都的所在地安阳地区也在平原省境内。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县级干部，曾经到新乡开会，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没有学过中国地理，所以新乡就成了我知道的除了山东省省会济南之外的第二个省会级大城市。但是，到我上高小的时候，平原省就撤销了，聊城就又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地区，当时我属的茌平县也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县。

现在想来，河南应该是我的半拉子故乡，就是从语言上说，我听不懂齐地的胶东方言，却能听懂河南话。但在后来，河南却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与我没有多少关系的省份，倒

有更加鲜明的记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自不必说，像西藏、新疆、内蒙古，一是因其大，二是因其远，三是因其为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就无法将它们从我的脑海里挖出去。别人不知道，对于我，一想起“我们的祖国”，首先想起的不是我们的首都北京，也不是我的故乡山东，倒是这三个边疆的大省（自治区）。大概这也有它的道理：“要不是有这三个大省（自治区），我们的祖国哪能有这么大呀！”东北，更是我们山东人熟悉的一片荒凉但肥沃的土地，是我们山东人在灾荒年外出逃荒的地方。我舅舅家的两个哥哥因为家里贫穷，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下了关东”，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户。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神话里的城市，与当代青年心目中的纽约差不多。它牵动的不是我的神经，而是我的想象。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东北的地图就愈加鲜活起来，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劳动模范王崇伦、《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在我们小小的脑海里摆得满满当当。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庆的石油以及王铁人的名字，更像一场地震一样震动过我们的脑海。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更忘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萧军即使不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作家，也是作家队伍中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萧红则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我们那里，人们一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总是说“到了云南、贵州嘎嘎二县”。“嘎嘎二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云南、贵州作为两个省份，却也因此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我对于广西的印象，并不深刻，但一旦将广东、广西连在一起，也就令我难以忘怀了。不知为什么，对中国文人赞赏的自然美景，我都没有多么深刻的感动，

倒是敦煌的鸣沙山，有着令我感动的荒凉。“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小学地理课本中就读到过，像杭州的西湖一样，并没有惹起我魂牵梦萦的向往。广东，那可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时时刻刻都会碰到的一个省份。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州又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策源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些文学大家也曾群集广州，那里一时成为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中心。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之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事，都与广东人有关。到了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又是在广东开始的。像深圳这样在几年间便拔地而起的现代城市，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少有的。与广东、广西有些相像的，则是湖北和湖南。武汉三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演出过几出大戏，闻一多、胡风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很炙手可热的两个著名作家，但湖南在我的脑海里则更加鲜艳夺目。舜帝在这里长眠，屈原在这里投江，而到了当代中国，毛泽东的名字几乎比“中国”这个名字更加响亮，更加辉煌壮丽。更莫提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湖南籍的元帅、将军、党政要员、作家、文人了。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陕西的延安、1949年之后的北京，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几颗最耀眼的明星。在《〈废都〉漫议》中，我曾说过陕西文化的一些坏话，说尽管说，但陕西省却不是容易被人忘却的省份，仅就1949年之后的文学，恐怕就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与陕西媲美。在河南作家群兴起的前夕，还有陕西的三部长篇小说进京，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柳青，新时期的路遥、贾平凹，都不是那种可以一笑了之的文学作家。我作为一个山东人，同样是不会忘记山西的，在改革开放前后，我们那个地区的主要对

“外”贸易恐怕就是与山西的贸易了。一辆或几辆卡车，装着我们家乡的粮食，到山西，再换回那里的煤来。吃的是山东粮，烧的是山西煤，我能忘掉山西这个省份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昔阳县的大寨、大寨的陈永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和“山药蛋派”的赵树理，也是时时提醒我不能忘记山西这个省份的诸多因素。

山东和四川，是两个相去甚远的省份，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它们又很奇怪地常常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道教文化有两个发源地，一个是山东，一个就是四川。到了当代，据说军队里最好的兵，一是山东兵，一是四川兵；山东兵憨直，四川兵机智，但打起仗来都是很勇敢的。“天府之国”的名称更是使我对四川有格外好感的原因。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作为陪都，则聚集了大量的文学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两个是浙江人（鲁迅、茅盾），两个是四川人（郭沫若、巴金），也是令人无法小觑四川的原因。至于邓小平，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当下的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比他的名字更加响亮。安徽作为一个地方，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多深的印象，但它出了一个陈独秀、一个胡适，就把这个省份整个地照亮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可以说是由两个省的文人搞起来的，一个是安徽，另一个就是浙江。在我这一生里，改变了我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外部世界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但改变了我感受外部世界的方式的，则是鲁迅。所以，浙江，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总觉着，有两个浙江，一个是秋瑾、徐锡麟、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的浙江，周作人则是这个浙江的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而另一个浙江则是与江苏

在文化上融为一体的不带贬义的才子佳人们的故乡。气候太好了，风景太宜人了，出产太富有了，生活太充裕了，因而与我们这些穷的省份过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吃穿不愁了，恋爱就变得重要起来，像苏州园林一样，曲曲折折、缠缠绵绵，抓也抓不牢，放又放不下，在身边的时候是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成了梦，成了诗了。所以在江苏，诗和生活是分不太清楚的，诗也是生活，生活也是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斯年力劝国民党政府将首都迁往北京，不要再定都南京。他大概是从风水的意义或从政治形势上来讲的，但从在我看来，苏杭是适于生活，特别是适于中国文人生活的地方，而不是适于战斗的地方。政治家得战斗，不能光生活。光生活，就离腐败不远了。国民党没有听傅斯年的劝告，结果失了大陆。倒是毛泽东，看准了北京这个地方。虽然他也做了很多错事，但忙忙活活地奋斗了一生，没敢消消停停地安下心来享受生活，所以他的政权始终固若金汤、不可动摇。国民党政府失了大陆之后，去了台湾，这使台湾在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格外引人注目。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颜色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台湾的印象，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台湾是我们的敌人，是反动派，那里的劳动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拯救。在新时期，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我们当时还穷得要命，所以颇有自惭形秽的感觉。199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我同屋的一个大陆青年学者就对我说：“到外面，不要说是大陆来的，就说是台湾人。”到了现在，大陆也富了许多，对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能以较为理性、较为平等的态度看待台湾了。但是，正因为对台湾的印象变了几变，所以对它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是福建

省。对台湾印象深，对福建省的印象也不会浅。炮轰金门、马祖，在那时是一件大事，那个时候以福建为背景的反特影片也颇受青年的欢迎。在初中时，引导我爱上文学的一个高中的大朋友考上了厦门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他还给我寄了一张厦门大学的全景照片。所以，我对厦门大学有极深的印象，一是知道它很美，二是知道它的政治经济系很有名。鲁迅又是在厦门大学任过教的，这就更使我难以忘怀了。至于许地山、林语堂都是福建人，尚在次要的地位。按正说，河北与河南也是两个相连带的省份，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当把北京和天津两个市从河北省抽了出去，河北省的魅力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河北在军事上当然十分重要，但我们那时关心的是像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战这样的“战事”，而不是部署在河北省这样的军事要地的“防线”。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河北省颇出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看过不少，但当时正是心高气傲的年龄，喜欢的是外国文学名著，在现代独重鲁迅，在当代“看得起”的几乎只有柳青，所以也没有将对河北省的印象激发到广东、湖南那样鲜活的程度。对河北的印象并不强烈，对河南的印象就更淡漠了。

二

要说，河南的事情也是知道一些的，但所有这些事情又都与河南这个省份联系不到一起。譬如说焦裕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激动了全国的人心的。那时我正在山东文登县（现文登区）泽库公社搞“四清”，是作为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大学生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四清”已经到了“四不清”干部检查交代问题的阶段，“四不清”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四清”工作队的队员集中在公社所在地开

会，勒令“四不清”干部交代问题。中间突然插入学习焦裕禄的事迹。我这个大学生自然得充当诵读者，读的则是穆青的长篇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平时读文件的时候，下面总是嘁嘁喳喳的，而这次，下面却是鸦雀无声。我以为大家睡着了，但抬头一看，却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低头流泪，我一停，下面的哭声就愈加大了起来。这些人的哭，可能有各种复杂的心情，但焦裕禄的事迹也确实能够感动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一次检阅红卫兵的时候，还把焦裕禄的女儿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说明毛泽东希望全国的党政干部，都要像焦裕禄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我，提起陈永贵，就想到山西省，而提到焦裕禄，想到的却只是兰考县，而不是河南省。“典型”是要有人“树”的：雷锋，是解放军“树”起来的；大寨，是当地（山西）的党政领导部门“树”起来的；焦裕禄，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宣传出去的，是他们“树”起来的。所以，直到现在，我看不出河南省较之别省更加重视焦裕禄的迹象。殷墟发掘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但好像与河南省本身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甲骨文研究原本是那些像罗振玉一类玩古董的中国文人搞起来的，到了王国维才真正成了中国学术中一个重大的领域，民国时期傅斯年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计划的殷墟发掘，郭沫若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中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但所有这些，都是从外边搞进去，而不是从里面搞出来的，在傅斯年领导中央研究院开始有计划的殷墟发掘的时候，还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发生了许多矛盾。郑州是中国现代铁路交通的枢纽，洛阳和开封是中国古代一些朝代的都城，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从河北的邯郸上车，一路经过河南的安阳、新乡、郑州、洛阳、开封等多个大城市。我想，

要是经过的是北京、上海，或者韶山、延安、绍兴（鲁迅的故乡）、乐山（郭沫若的故乡），我肯定是要下车去看一看的，但研究生三年，往来五六次，却从来没有半途下过车。总之，长期以来，对于我，河南只是一个省的名字，好像与我没有关系一样。

河南之引起我的关注，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当时在北京召开了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张宇的《疼痛与抚摸》两部长篇小说的座谈会，不知为什么，我也在被邀请之列。正是这两部小说，使我突然想到了河南，想到了我还与河南有些瓜葛。我的“文艺思想”有些简单，鲁迅有一篇《无声的中国》，是感慨中国没有声音的，所以我读文学作品，只要有点“怪味”就可以。因为“怪”，才是一种声音，与别人的声音不同的一种声音。这样的声音多了，“无声的中国”就成了“有声的中国”，活着，就不那么寂寞了。万一从这种“怪”中悟出一点道理来，就又可以使自己想想平时不会想到的“思想”。至于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得诺贝尔奖金，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入史传世，我认为，并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恰巧，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怪怪的那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精英知识分子（我得过一个博士学位，虽然是在中国得的，但要向精英知识分子堆里挤，还是勉强挤得进去的）忙着思考中国社会思想的启蒙问题；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思考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了。我们精英知识分子文化，总有个“纲”：“纲举目张”。那时的“纲”就是“现代性”，在都市文学中，更“现代”的就是“后现代性”，而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则既不像现代的，也不像后现代的，但要说古典的，那就更离谱了。它选取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母亲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她在这个日益繁华的世界上就变得愈加无依无靠了。不难看出，它这个视角本身，就有点“妈妈的”。它没有否定